

宋紹定本《童蒙訓》的刊刻與傳藏

曾紀剛

書之所載，自立身行己、讀書取友、撫世疇物，仕州縣、立朝廷，綱條本末，皆有稽據。大要欲學者反躬抑志，循序務本，切近篤實。不累於虛驕，不驚於高遠。由成己以至成物，豈特施之童蒙而已哉！雖推之天下國家可也。

——宋 樓昉《跋》

撰述脈絡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周易·蒙卦》）啓蒙之道，在中國古代有其悠遠的歷史傳統和深刻的理論思維，從而轉衍累積成豐厚多元的蒙學典籍脈絡。當幼童脫離基礎的識字、書寫階段，便要迎向歷史文化、學術經典、倫理道德、詞章創作等更進一步的陶養與鍛鍊。《童蒙訓》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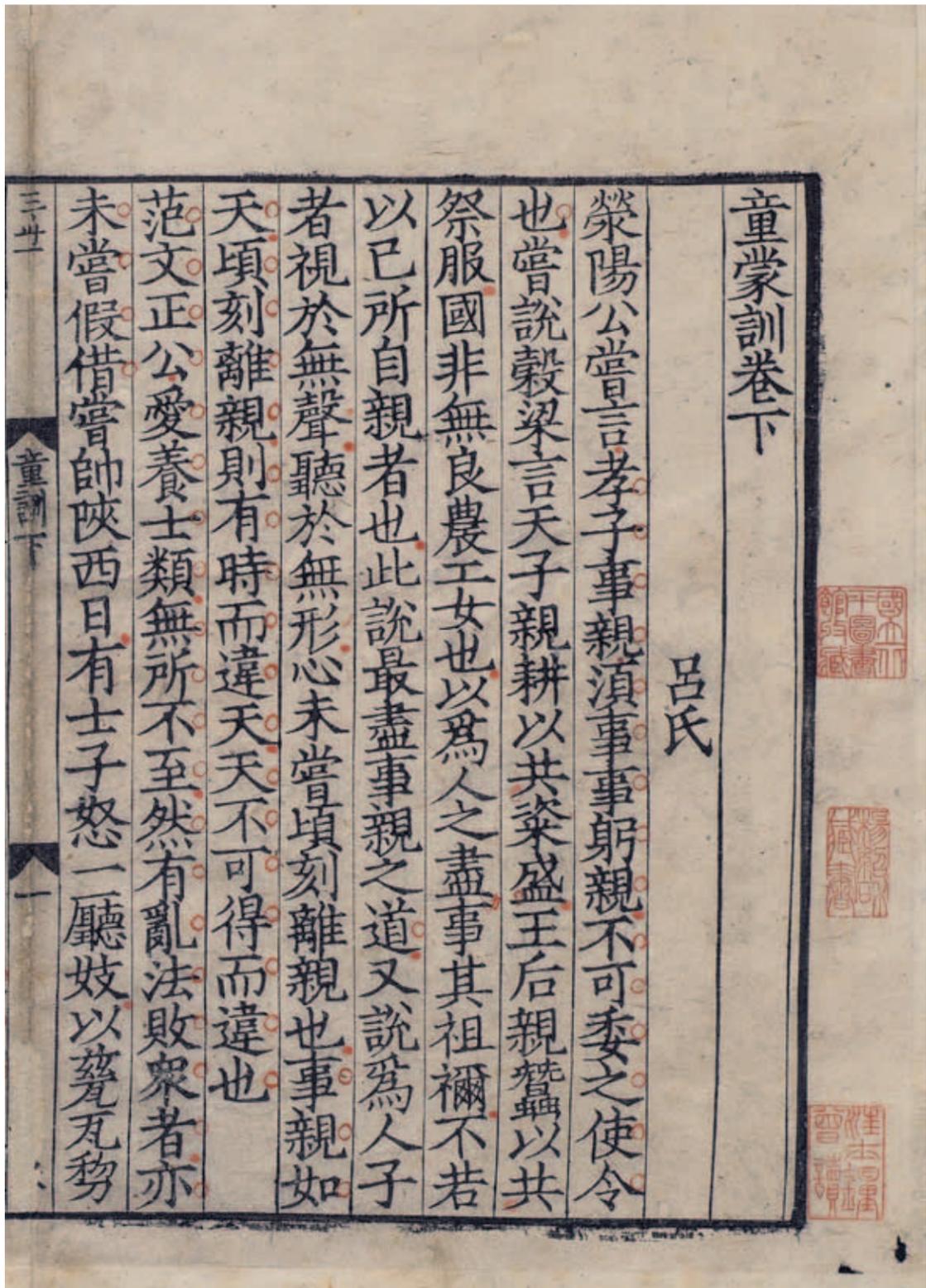
即是宋代文人呂本中（一一〇八—一一四五）為其家族學子塾堂訓課所編寫的啟蒙讀本。

呂本中，字居仁，開封人。宋高宗紹興六年（一一三六）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後因背忤秦檜，遭御史誣劾。所著《春秋集解》、《官箴》、《童蒙訓》、《紫薇詩話》、《東萊詩集》皆獲寫入《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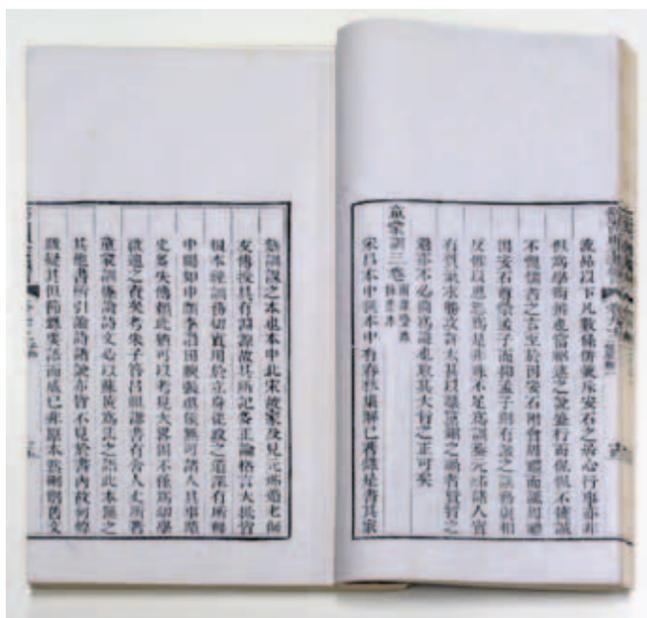
另曾撰《江西詩社宗派圖》，首揭古代文學史上「江西詩派」此一詩歌流派概念。人稱「東萊先生」，《宋史》有傳，且論曰：

（呂本中等）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厲世，然皆議論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慨矣。

呂本中出身北宋最具代表性的仕宦家族，累世卿相，烜赫至極。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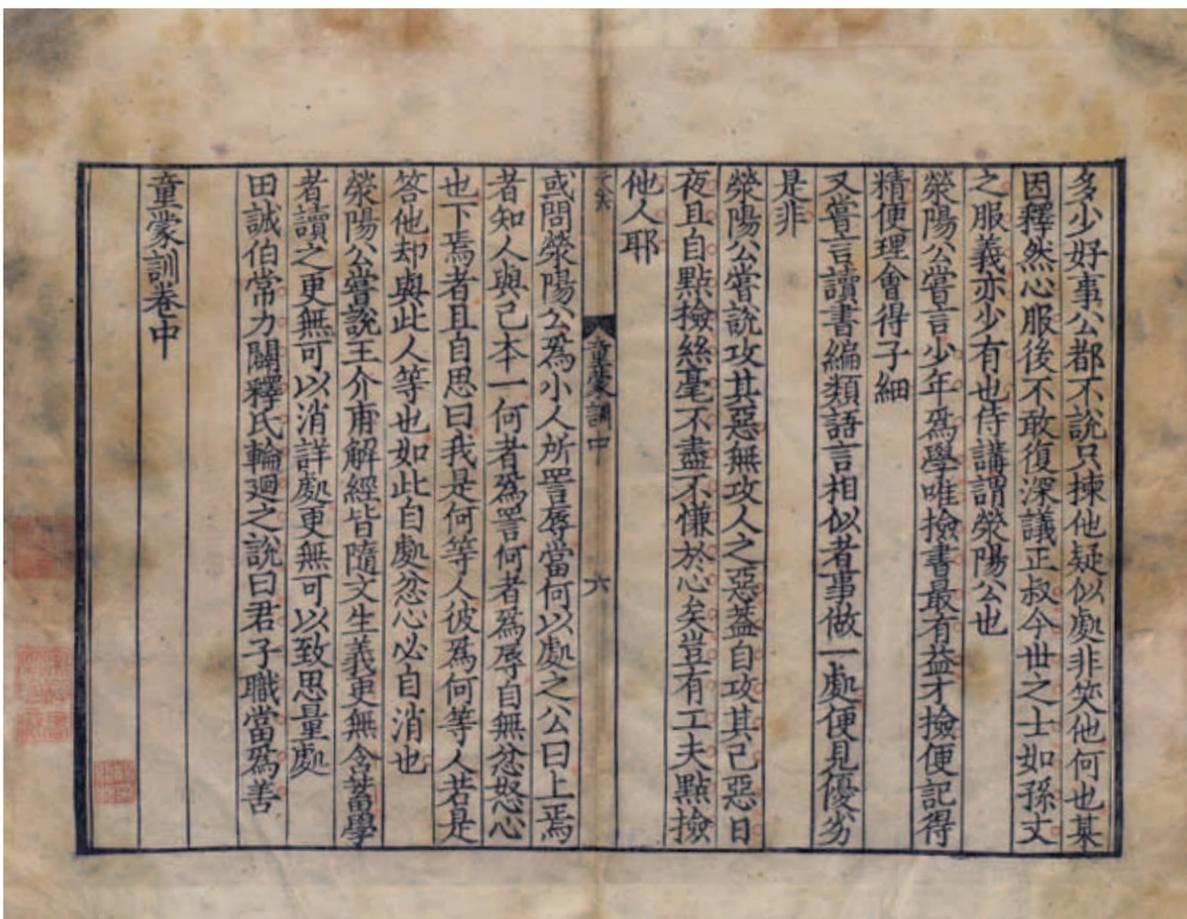
宋 呂本中撰 童蒙訓 宋紹定2年李埴壽州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清 紀昀等奉敕纂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清乾隆60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世紀初期的文化背景、教育環境，以及人們對於知識和教養的期望之下，作為一代政治與文化精英的世家大族，對於下一代的「啟蒙」是從哪些方面著眼與著手？

從今日通行傳本來看，呂本中輯撰《童蒙訓》之體例類似筆記或語錄，共彙集一百七十五條宋代名賢佳言懿行，內容多偏重於讀書論學門徑，以及修身處事的原則。呂本中受



圖一 宋 呂本中撰 童蒙訓 宋紹定2年李道壽州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時代風潮之浸染，著意彰顯道學家的學術宗旨與師承譜系；而呂氏一族的顯赫家世，則藉由這部私家教材所載錄先祖之言行、交遊，傳遞有關學問、品格、教養的理念乃至實踐。當中部分內容，雖受限於特定背景，猶能尋繹出亙古常新的錦言至論：人若觀之愈喜，不啻反證其行之愈難？諸如：

仲車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卷上）

榮陽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己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卷中）（圖一）

呂本中得天獨厚的成長環境，配合書中貼近生活經驗與個人聞見的撰著方式，使得《童蒙訓》不僅廣為同代之人交相傳誦、援引，亦成就傳統蒙學典籍一特出之作。清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也將呂氏《童蒙訓》鈔入子部儒家類中，並賦予正面的學術評價：

世伯祖呂蒙正、高祖呂夷簡、曾祖呂公著皆拜相位，輔翼太宗、真宗、仁宗、哲宗四朝政事。呂氏家族成員身兼名臣與大儒者，可謂無代無之，共有十七人登列《宋元學案》，為世所宗；呂本中侄孫呂祖謙（一一三七～一一八一）更是博綜諸家之長，與南宋理學巨擘朱熹（一一三〇～一一八〇）、張栻（一一三三～一一八〇）二人「鼎立為世師」（黃震《黃氏日抄》卷四七）。神宗朝宰相王珪（一〇一九～一〇八五）在為呂夷簡簡長子呂公綽撰寫墓誌銘時便點出：

天下之人談衣冠之盛者，必以呂氏為世家。（《華陽集》卷五十一）

南宋學者王明清亦稱：

本朝一家為宰執者，呂氏最盛。（《揮塵錄·前錄》，卷一）

另一方面，正因家族聲聞顯揚，相與結交或往來之人，盡是宋代最負盛名的權貴和學者：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二程兄弟、三蘇父子、梅堯臣、曾鞏；等等，為呂本中提供了獨特的成長環境與家學傳統。更令人好奇：在八百年前、十三

本中北宋故家，及見元祐遺老，師友傳授，具有淵源。故其所記，多正論格言。大抵皆根本經訓，務切實用，於立身從政之道，深有所裨。中間如申顏、李潛、田腴、張琪、侯無可諸人，其事蹟史多失傳，賴此猶可以考見大畧，固不僅為幼學啟迪之資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二）（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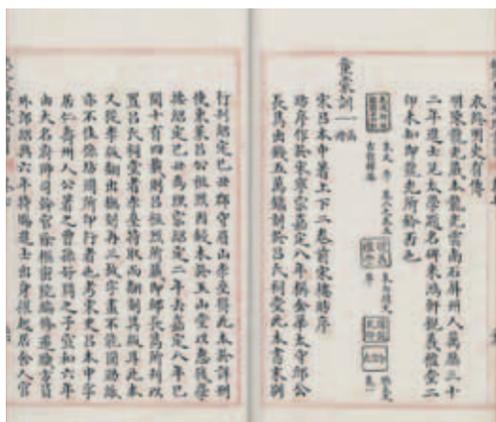
四庫館臣在讎校群籍的學術工程中，察覺許多成書於南宋的著作，皆曾轉引或摘錄《童蒙訓》的內容，唯關乎詩文品評者，概不見於今本；其涉及為官之道者，又與另一部呂本中所撰《官箴》相合。由此推論，存世通行的《童蒙訓》並非完整原貌，或許在傳鈔刊刻的過程中，因故芟削詩論，復令官箴別自成書，最後將既有治學修身的內容分割為三卷行世。

刊刻歷程

院藏宋版《童蒙訓》二冊，係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善本。版框半葉高二·二公分、寬十六公分。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



圖七 右：明翻宋紹定2年李埴壽州刊本 左：民國14年陶湘刊託跋慶叢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清 彭元瑞等奉敕編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 清嘉慶間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華市)太守丘壽雋捐錢五萬，亟欲訪求善本鋟版傳世，學者樓昉於是邀約呂祖謙之侄呂喬年，將家藏伯祖呂大器手錄本予以校正付梓；此「嘉定本」遂成爲《童蒙訓》最稱精善之刊本，樓昉且應呂喬年之請，記述刻印始末。至理宗紹定二年(一二二九)，眉山山人李埴擔任壽州(今安徽省鳳台縣)郡守，復據呂大器之子、提刑官呂祖烈家藏嘉定舊帙重新刊刻；除依原式摹刻樓昉跋尾(圖四)，另於卷末留下刊書識語，足資後人辨定此本之版行時代、地域暨相關人事因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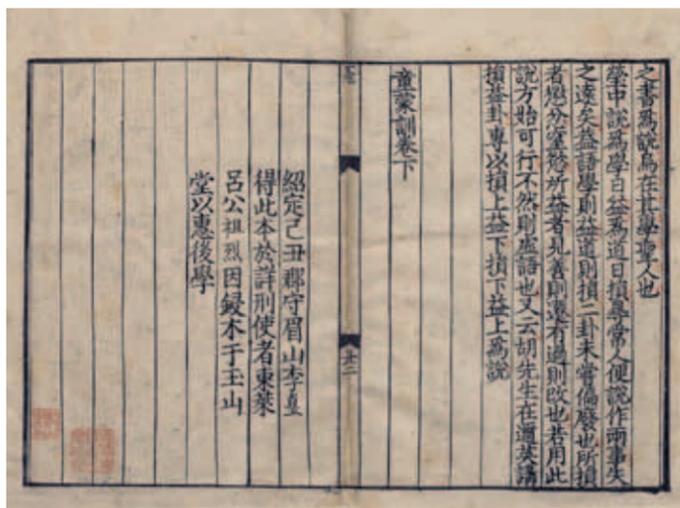
紹定己丑，郡守眉山李埴得此本於詳刑使者東萊呂公祖烈，因鋟木于玉山堂，以惠後學。(圖五)

宋刻《童蒙訓》傳世絕罕，本院典藏此帙，即宋紹定二年李埴壽州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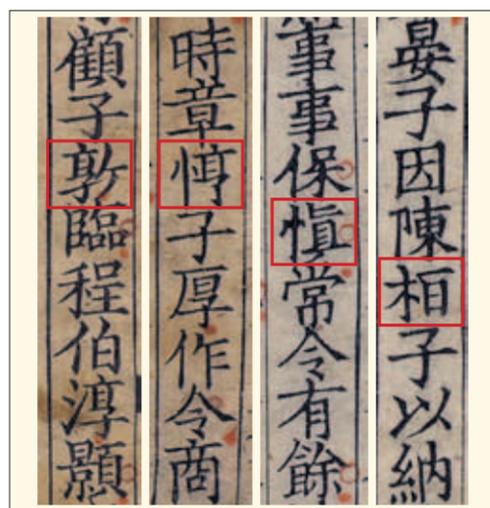
紹定本至明代嘗有書坊翻刻，流傳漸廣。翻刻本無論書籍內容、行款避諱、序跋刊記，固然可謂規模原刊，亦步亦趨；一旦並陳而觀，彼此之字體刀法、紙墨風韻，卻有霄壤之別。清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以及乾隆、嘉慶二朝始建暨續輯「天祿琳琅」特藏，所著錄者皆爲明翻宋本。四庫館臣在未見舊刻的條件下，自應慶幸明人翻雕之書「行款字畫，一仍其舊，最爲善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二)，頗具傳存撰著原貌的正面意義。若從版本賞鑑的立場品評，致力於蒐羅歷朝佳槧的詞臣，則以「樵刻再三，字畫不能圓勁，紙亦不佳，係坊間所印行者也」(《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七)(圖六)這般直接且略顯輕鄙的語句議論書坊翻刻的版本價值。由此，若再得見藏書名家以「東施效顰」(楊紹和《楹書偶錄》，卷



圖四 宋嘉定8年樓昉跋



圖五 宋紹定2年李埴刊書識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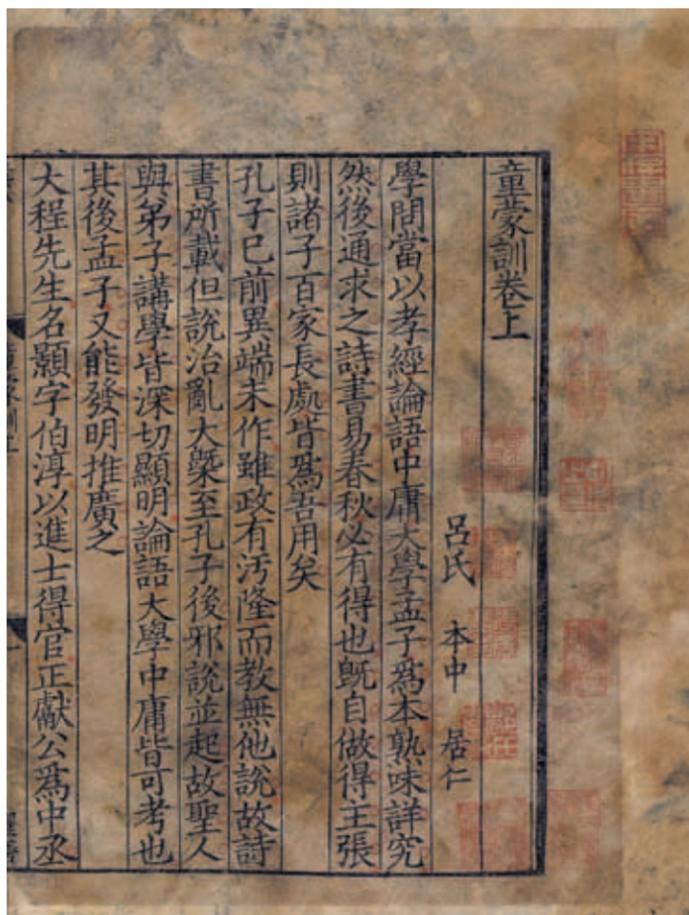


圖三 宋紹定本《童蒙訓》中的避諱字

相同。左右雙欄，白口，雙黑魚尾，間有單黑魚尾。書口記字數，上魚尾下記「童蒙訓」或「童訓」或「童蒙」上、中、下，下魚尾下記葉次。版心下偶見刻工名氏：翟善(或作「善」)、文、任良(或作「良」)、蒲日、張丙、田元、田仁(或作「仁」)、成、明、巫、田乙、田、書。文中遇「桓」、「慎」、「惇」、「敦」等字或缺末筆(圖三)，乃避欽宗、孝宗、光宗諸帝名諱。

此本刻印俱精，開版宏闊爽朗，展卷即悅人眼目。寫刻字畫方嚴端正，雅近歐體而更顯瘦勁，加之刀法不苟、紙潔墨濃，全書竟無一處斷版，當可推測屬於較早印本，堪稱宋刻之上乘。行間留有前人朱筆圈點、句讀，偶見校字。至於書葉悉經裱補，仍維持蝶裝舊式，益顯古雅可寶。

呂本中《童蒙訓》在南宋時期曾經數度刊行，先是初刻於湖南長沙，其後福建龍溪亦見傳本，唯皆舛訛甚繁，不堪誦習。宋寧宗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婺州(今屬浙江省金



圖八 《童蒙訓》收藏印記



種二十九卷，即曾將《童蒙訓》列為第一種，且於目下著曰「嘉定本」。披檢書葉，陶氏所收殆明翻宋紹定本也。（圖七）

傳藏蹤緒

朱色盈潤的收藏印記，是古今藏書文化中一道別緻的風景。文字暨形、色各異的藏書印，在楮墨書葉上自有其輕重布局與鈐蓋規律，不僅流露藏家賞玩品讀的思緒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後人鑑別版本並考索遞藏源流之實證。在院藏宋紹定本《童蒙訓》中，共鈐有十八方藏印，先後連綴成一段人物聚散、世運浮沉的傳藏蹤緒。

首卷卷端版框內自下而上，可見「莫氏壽樸堂記」白方、「都氏玄敬」白方、「張侯之印」朱白方、「黃復之印」白方（圖八），要皆為明人印記。「壽樸堂」乃明初吳興仕族莫氏居處，位於蘇州綺川，由莫芝翁始建，因傍

三 比況取喻，則又不為誇辭矣。

然而，仍有嗜書者將翻刻本誤認為宋本。嘗獲傳增湘（一八七二—一九四九）譽稱其收藏質量與鑑別工夫「有推倒一時豪傑之概」（《涉園明

本書目跋），也曾受聘為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專門委員的大藏書家、

刻書家陶湘（一八七〇—一九四〇），於民國十三年至十七年間輯刻《託跋塵叢刻》，影刊宋、明以及鈔本共十

一奇幅古樸樹而題名。莫氏曾得詹希原書匾，字徑一尺，方孝孺亦為之作《記》，（今俱不存）當時詩人陶振則以「牙籤插架幾千卷，壽樸千雲高十尋」形容其家藏書景況。洪武末，莫氏因坐黨禍遭籍沒家產，藏書散出，宋版《童蒙訓》後為吳中文士都穆（一四五九—一五二五）所得。穆字玄敬，號南濠居士，平生博涉群籍，精修為學，至老不倦，是明代中期頗負盛名的學者，與沈周、吳寬、王鏊、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人相交甚善；所撰《金雅琳琅》、《寓意編》皆獲鈔入《四庫全書》，其他著述亦多元而豐富。樓昉《跋》末另鈐有「南濠居士」白方、「都氏玄敬」朱方，亦為都穆所有。明代中後期，此書續經張侯、黃復收藏，今尚難詳其行實。

《童蒙訓》刊印於浙江，六百餘年來，珍祕之跡不出蘇州地界。清嘉

慶、道光年間，輾轉由大藏書家汪士鐘購藏，因而留下「汪士鐘曾讀」朱

文長方印，以誌書緣。士鐘字閩源，憑恃優越的家族資財與勤勉好學，僅花費極短的時間，便盡得蘇州四大藏家（黃丕烈、周錫瓚、袁廷禱、顧之逵）遺籍。汪氏「藝芸書舍」曾藏宋版三一九部、元版一五二部，有清代，海內無雙；紹定本《童蒙訓》即著錄於《宋板書目·子部》之列。藉由顧千里（一七六六—一八三五）道光二年（一八二二）所撰《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序》，或可想見昔日汪士鐘蒐書之

力勤、藏書之美富與愛書之情深：汪君宿具神解，凡於有板以來，官私刊刻，支流派別，心開目瞭，遇則能名。而又嗜好所至，專意在茲；仰取俯拾，兼收並蓄；揮斥多金，曾靡厭倦。以故郡中傳流有名秘笈，搜求略遍；遠地聞風，挾冊

趨門，朝夕相繼，如是累稔。遂獲

目中所列宋、元若干種，既精且博，希有大觀。海內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汪君之於宋、元本，可謂知之深而愛之篤矣。

然而，如此勝景並不久長。隨著汪氏子孫重商輕文且經營失利，家藏善本於是逐漸散出；逮乎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太平軍攻克蘇州，藝芸書舍藏書竟已一本不存。盛極轉衰，聚而復散，前後不過四十載浮光掠影。

「藝芸散後歸何處？盡在南瞿與北楊」。（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八）汪士鐘舊藏宋、元版珍籍在家道與國運的牽引下，一部分轉歸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另一部分則為聊城楊氏海源閣所購得；《童蒙訓》自是始由吳中北入齊魯。書中除首冊前副葉鈐有「海源閣」朱文長方印，他如「以增之印」白方、「關西節度系關西」朱橢、



汪士鐘曾讀



海源閣



以增之印



關西節度系關西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

存。民國三十年秋，北平圖書館自存滬善本中挑選一〇二箱精品分批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童蒙訓》亦隨之遠渡重洋。民國五十四年，北平圖書館善本運返臺灣，繼由國立中央圖書館寄存於本院。七十三年八月，行政院同意本院負責典藏這批圖書。翌年三月，本院與中央圖書館完成點交程序。至此，這部幾乎見證近代藏書聚散史的《童蒙訓》，總算結束迢遙萬里的飄泊，與故宮遷臺國寶文物同享至為妥善的典藏環境與展示空間。

明末藏書大家毛晉（一五九九—一六五九）曾有一方藏印，曰「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用以鈐蓋在汲古閣所收最稱孤罕貴重的善本上，意謂此書得以傳藏至今，冥冥之中自有一股庇祐護持的力量。院藏宋紹定本《童蒙訓》，承載呂本中獨特的家族歷史與教養理念，歷經近八百年傳藏周折，跨越南北東西千萬里路，除了機緣風會的交錯，更匯集世世代代好古惜物之士的熱忱與犧牲。今人有幸親炙祕寶，又豈止於飽一眼福而已？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楊紹和藏書

彥合珍玩

楊印紹和

協卿讀過

「楊紹和藏書」朱長、「彥合珍玩」朱方、「楊印紹和」白方、「協卿讀過」白方諸印，皆為海源閣兩代主人楊以增（一七八七—一八五六）、楊紹和（一八三二—一八七六）父子鑑藏印記。此外，楊氏嘗「別開書室曰『宋存』，藏天水朝舊籍，而以元本、校本、抄本附焉」（《楹書偶錄》序），《童蒙



楊氏海源閣「宋存書室」藏書印

訓》中三見「宋存書室」白長、「宋存書室珍藏」朱長、「聊攝楊氏宋存書室珍藏」朱方，正足以映現閣主珍重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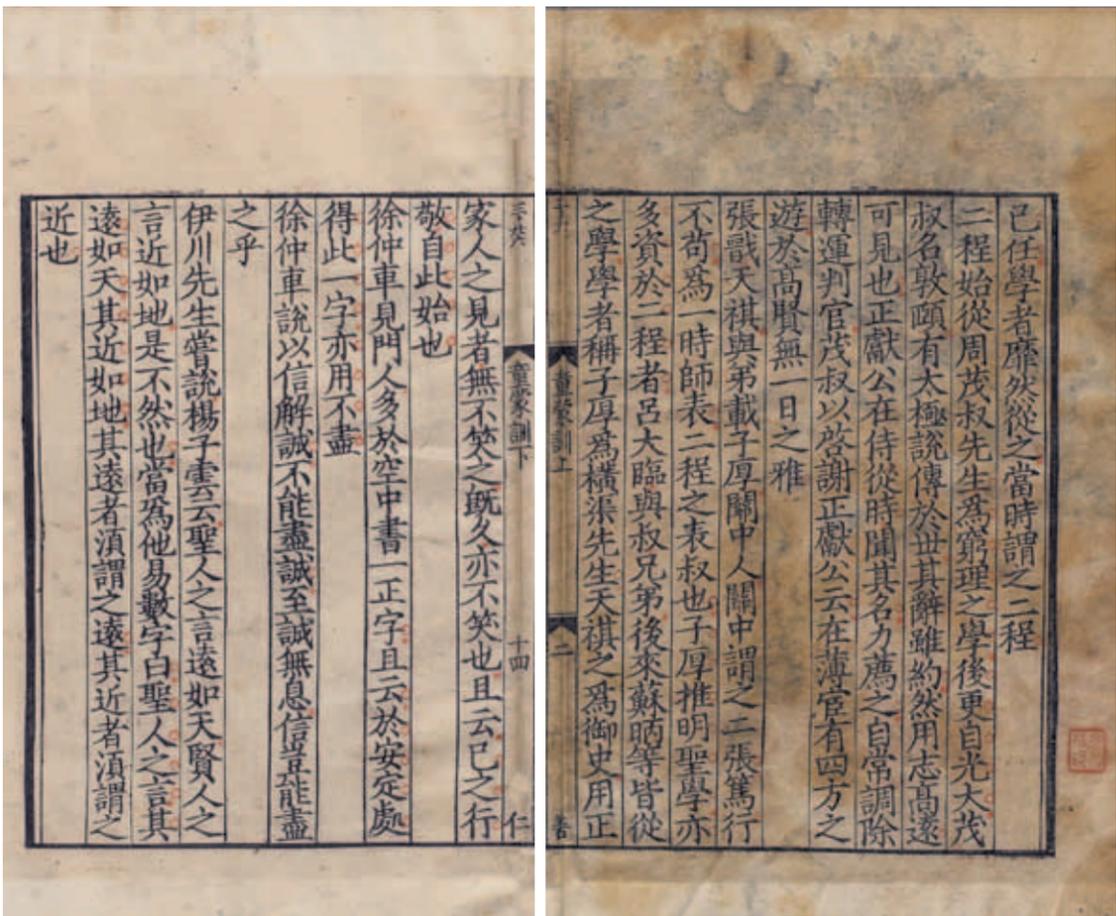
在清末藏書聚散的版圖中，楊氏海源閣不僅雄峙北方，亦與瞿氏鐵琴銅劍樓、湖州陸心源皕宋樓以及杭州丁丙八千卷樓鼎足海內。楊氏宋、元本數量雖不及瞿氏，若論藏書內涵之精與博，卻無人可出其右；其宋版「四經」、「四史」十三種，尤為書林冠冕。唯古籍難聚而易散，海源閣藏書同樣因為家國不靖而迭經兵燹摧殘、盜匪掠奪。《童蒙訓》便在海源閣遭逢軍閥盤據洗劫的動盪中輾轉流出，最後竟淪落至路旁市集的舊貨攤上。雷夢水（一九二一—一九九四）

《書林瑣記》曾追憶這段曲折歷程：一九三〇年春，軍閥王冠軍陷聊城，海源閣又遭一劫。王冠軍劫取宋元珍本八大箱：悉數運往其家保定：尚有一部分被其部下劫取，流傳民

間，當時正值兵荒馬亂的年月，民不聊生，識書者亦少。有的變賣家藏故物，亦有趁機兜售劫取之物，即在集市上設攤出售。這年夏天，琉璃廠書業崇文齋主人孫瑞卿由北京返里探親，乘火車至德縣打尖。恰逢該處正當集市，喧鬧異常。孫氏步行游逛，偶於舊貨攤上發現擺有古書一堆，無意中竟檢出一部稀世珍本宋刊《童蒙訓》兩冊。孫喜出望外，即以廉價購入，致使寶貴珍本免遭於毀。孫氏與高采烈地攜書返回北京，得善價售歸國立北京圖書館。（海源閣珍本的散失）

今日所見上冊書葉滿布水漬霉傷斑痕，當為民初戰亂時期飽受磨難的跡證。比對下冊紙色之潔淨（圖九），或能揣想此書歷經七百年傳藏，在逸出海源閣之前，仍然完好無損，即有些微蟲蛀，亦不曾稍減原刻之精采。

《童蒙訓》入藏北平圖書館後，時局依舊不安。隨著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乃至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部分館藏善本也在各界的奔走與館員的維護下，從南遷安置轉向運美暫



圖九 右：上冊有明顯的水漬霉斑 左：下冊保存狀況相對良好